

宗教信仰与农村居民社会网络: 信教者的朋友更多吗? ——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检验

王术坤 董永庆 许悦*

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 构建衡量社会网络的指标体系, 运用实证模型分析了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的结果显示: 与不信教者相比, 信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更大、财务支持网规模更小, 在情感支持网规模方面则没有显著差异。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工具变量法 (IV) 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 信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更大以及情感支持网规模未见显著差异这两个结论高度稳健, 但是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财务支持网规模更小这一结论不够稳健。本文提供了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直接影响的实证证据, 为国内宗教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补充。

关键词 宗教信仰 社会网络 农村居民

一、引言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丰富 (金泽和邱永辉, 2013)。根据中国宗教调查 (China Religion Survey, CRS), 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大众道德、心理与人文教育等多个社会服务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性力量。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 WVS) 的数据显示, 2001—2012 年我国信教者的比例由 6% 迅速上涨至 13.7%, 且宗教的信仰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此外, 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居民中大多为农村居民 (金泽和邱永辉, 2008), “宗教热”在农村地区的迅速兴起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 (谭飞等, 2007)。宗教作为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承载者, 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 我国的宗教研究逐渐活跃, 但是起步较晚且尚处于发展阶段 (金泽和邱永辉, 2012)。目前, 将我国农村的宗教与社会、经济等结合起来的研究则更少, 已有研究

* 王术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E-mail: wangshukun@cass.org.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邮编: 100732; 董永庆,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与数据中心, E-mail: dongyongqingchina@163.com,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第 25 教学楼 A 座 701 室, 邮编: 300072; 许悦 (通讯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E-mail: xuyue2825@ruc.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邮编: 100872。感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2019M651046、2019T120188)、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 (编号: 201623) 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018—2019 学年学生科研训练项目 (编号: 18-19B26) 对本文的支持和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院荣平副教授等学者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 文责自负。

主要集中于宗教对社会保障(郑风田等 2010)、社会信任(阮荣平和王兵 2011)、公共支出(阮荣平和刘力,2011)、公共财政(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社会冲突(阮荣平等,2014)等方面的影响。宗教与社会网络方面则留白更多,较有代表性的是阮荣平和王兵(2011)分析了宗教信仰对个人化信任和社会化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教对社会化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事实上,宗教是社会网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Putnam,2000),在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多方面都显示出了指引作用(Anderson等,2004)。特别是对农村居民而言,其社会网络仍以亲缘关系为主(黄瑞芹,2009;张文宏和阮丹青,1999),相比之下,信教的居民有机会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更易与教友形成合作的态度(Guiso等,2003),并且宗教信仰能制约利己主义行为,促进信教者与陌生人合作(Buchanan,1971),形成更为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某些宗教会伴随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报复心理(Guiso等,2003;Greer等,2010),会对周围的人和社会产生不和谐的影响,使信教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减小。Welch等(2004)认为,得出宗教与社会网络正相关结论的研究并未考虑到其余重要变量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其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和地理位置等变量后发现,信教者彼此之间更加不信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宗教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关系的构建并没有显著作用,只有在社会运动或者正式组织的推动下才会对人际关系产生作用(Bainbridge和Stark,1981)。

由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宗教信仰结构和社会环境相差较大,衡量指标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可能也会有较大差异。为探究我国农村地区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对我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1739个农村居民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微观调查数据、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以及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主要汇报了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第五部分对实证模型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宗教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讨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研究支持了社会网络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作用(Jackson,2003;Wal和Boschma,2009;Cela等,2015;杨汝岱等,2011;易行健等,2012)。社会网络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不同个体间各种关系相联结形成的集合(Kilduff和Tsai,2003),是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阮丹青等,1990)。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传播信息和互相了解对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根据嵌入理论,当个人的观点和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和资源互换的网络中,就会形成“社会资本”(Granovetter,1985),进而不同个体联合起来又会创造出持久的、功能完善的社会(Borgatti等,2009)。社会网络具有多个维度的分类方法,包括网络形式(Birley,1985)、关系强度(Granovetter,1973)、网络主体(Butler和Hansen,1991;张文宏等,1999)、联系性质和主体对象(叶敬忠,2004)等。按照网络主体是个体或群体的不同划分,本文研究

的社会网络是指农村居民个体间的人际网络。

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机制可用阮荣平和王兵(2011)所提出的宗教信仰的信仰效应和组织效应来解释。这两种效应主要作用于信教者的个体化信任和社会化信任水平。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不仅是社会网络的结果,也可能是其前因(Smith和Lonhrke,2008)。通过增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信任可以促进合作,从而构建社会网络(Seligman,1997;王宇和王士权,2017)。

宗教的信仰效应即通过重塑信徒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增加个体的信任水平。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较封闭的传统型乡村网络(黄瑞芹,2009),其社会网络关系主要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这类强关系为主(费孝通,1985),罕有建立弱关系联结的机会和意识。根据CRS(2015)研究报告及本文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信教居民多为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中老年人。对于这类人群而言,其社会网络构建的渠道更加受限,精神更加空虚,该群体本身的弱势特征会导致其在正常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更易产生“被掠夺”感,易受到不平等遭遇感知(霍鹏等,2018),其社会化信任感可能较低。通过宗教实践,信仰效应可能使其产生更有共鸣感的社交体验,在社会交往中发掘更加平等的社交关系,农村的中老年人信教者可能会因此寻求到更多的社会网络构建渠道。不少研究表明,信教者往往具有善意的举动,更好的精神健康、更稳定的婚姻关系、更少的犯罪和违法活动等(Iannacone和Laurence,1998;Putnam,2000;Brooks,2003,2005),且越是虔诚的教徒越会愿意结识陌生人,和陌生人合作(Orbell等,1992)。因此,信教者可能会具有更高的个体信任水平,其扩张社会网络规模的主观意愿和机会可能会比非信教者更大。

宗教的组织效应则是指宗教作为一种组织,会通过其组织性(如集体活动)等影响个体的社会化信任水平。信教者通过参加定期的宗教活动(如礼拜等),增加教会成员的交往频度,提高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凝聚能力(Ruffle和Sosis,2007)。此外,信教者还会更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捐赠活动等非正式的集体活动(Putnam,2000;Brooks,2003,2005)。而社会参与频度的提升增加了扩大社会网络规模的几率。宗教信仰通过影响信教农村居民的社交参与频度,可能会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拓展弱关系社会网络,扩张其社会网络规模。另一方面,根据CRS,中国宗教与政府、国家之间保持着和谐关系,确保了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建立。各级政府以主动的态势访问宗教场所,推动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实现。受到政府支持的宗教场所具有农村居民个人所不能及的社会资本,在开展组织性的集体活动及社会慈善、志愿公益等活动时,会为农村信教居民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通过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及慈善活动等非正式集体活动,教友之间会形成较强的非正式社会互助机制(阮荣平等,2014)。因此,宗教的组织效应可能会增加弱关系资源的可获取范围,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财务支持。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H1: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有正向作用。
- H2: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情感支持网规模有正向作用。
- H3: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财务支持网规模有正向作用。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描述性分析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CLDS在全国范围内对以社区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展开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主要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同时还使用了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本文主要使用CLDS在2014年调查的截面数据。该数据涵盖了调查样本的宗教信仰、社会网络、工作、迁移等多个内容,本文主要选取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变量进行分析。

CLDS(2014)调查对象涉及我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级行政区(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居住社区为村委会且为农村户口的农村居民样本进行分析,在剔除空缺值和异常值后得到有效样本10739个。

(二) 变量选取

本文从调查数据中选取了与宗教信仰和社会网络相关的变量。对于宗教的测量指标,涉及的主要调查问题是农村居民信仰的宗教种类、参加教会的频率以及当地是否有宗教建筑物等。本文借鉴郑风田等(2010)和阮荣平等(2014)选取宗教信仰的指标,如果农村居民信仰宗教则为1,不信仰宗教则为0。

社会网络指标的选取。综合本文的研究问题,借鉴Burt(1984)、Boyd和Ellison(2007)、张文宏和阮丹青(1999)、章元等(2008)、黄瑞芹(2009)等学者对社会网络的测量指标,本文构建社会网络规模变量,在调查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1)“在本地,您有多少关系密切且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同时本文将社会网络规模进一步细分为情感支持网络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采用问题(2)“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向他/她诉说心事的有几个?”和(3)“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向她/她借钱(5000元为标准)的有几个?”分别予以测量。

另外,考虑到影响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因素较多,例如,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村民聚居状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社会网络,为了更加准确地识别宗教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在相关文献(张文宏和阮丹青,1999;张文宏等,1999;阮荣平等,2014;Boyd和Ellison(2007);Burchardi和Hassan,2013;等等)的基础上,选取了受访者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并且在模型中控制了省级层面的虚拟变量。其中,个人层面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是否中共党员、教育、工作类型等。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数。村庄层面我们选择了本村户籍人口数量。由于受访者的工作种类较多,本文将工作分为五类,即行政事业单位及公有制企业(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国有与集体事业单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村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私有企业(包括民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自雇佣(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务农和没有工作。另外,本文将受访者家庭收入平均分为五组,即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具体的变量

指标和说明参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描述
因变量					
社会网络	11.20	21.09	0	200	在本地 您有多少关系密切 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
情感支持网	4.14	6.42	0	150	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 您可以诉说心事的有几个?
财务支持网	3.03	4.61	0	50	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 您可以借钱(5 000 元为标准)的有几个?
自变量					
信教	0.13	0.34	0	1	0=否;1=是
性别	0.52	0.50	0	1	0=男;1=女
民族	0.13	0.34	0	1	0=汉族;1=少数民族
年龄	45.45	14.87	15	90	周岁(年)
婚姻状况	0.84	0.37	0	1	0=没有伴侣(包括未婚、离异和丧偶);1=有伴侣
工作类型	3.83	1.05	1	5	1=事业单位;2=私有企业;3=自雇;4=务农;5=没有工作
中共党员	0.04	0.19	0	1	0=否 1=是
教育	2.48	1.02	1	5	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专及以上
工作经历	1.51	0.76	0	2	0=无工作;1=有打工经验;2=无打工经验
收入分组	3.23	1.26	1	5	1=低收入;2=中低收入;3=中等收入;4=中高收入;5=高收入
家庭人口	4.90	2.01	1	20	被访者家庭总人口数
村户籍人口	2 503	2 254	120	20 100	被访者所在村 15—64 岁的人口数
工具变量					
教堂	0.08	0.28	0	1	本村是否有教堂:0=否;1=是
寺庙	0.34	0.47	0	1	本村是否有寺庙:0=否;1=是
清真寺	0.05	0.21	0	1	本村是否有清真寺:0=否;1=是

注:工作类型、教育、工作经历、收入分组在下面实证模型中分别采取分组的虚拟变量。

(三) 描述性分析

1. 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

根据 CLDS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地区农民信教比例为 13.3%,这一数值与目前文献中使用的其他微观调查数据的结果较为相近。例如,阮荣平等(2014)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在 2006 年、2008 年和 2010 年的调查数据得出,中国信教者的比重分别为 10.2%、11.9%和 12.7%;WVS 在中国的调查显示,2001 年、2007 年和 2012 年中国信仰宗教的比例为 6%、11.2%和 13.7%;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固定观察点调查”的村级数据显示,有超过一半的村有宗教信仰,但是信徒比重偏低,约占调查村总人口的 10%。由此从侧面反映出 CLDS 数据中关于宗教调查的数据是可靠的。

表 2 描述了受访地区我国居民的信教情况。我国农村居民主要信仰佛教、伊斯兰

教和基督教,三种宗教信仰人数占样本总人数的12.3%,占信教人数的92.5%。这一数据略高于利用CGSS(2006)数据得出的80%(阮荣平等,2014),显示出这三大宗教在我国的传播日趋广泛。在信仰宗教的农村劳动力中,信仰佛教的人数最多,占到6.8%;其次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占到3.2%和2.3%。该组数据中,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比例与WVS在中国2012年调查的数据接近,WVS数据显示2012年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比例分别是9.2%和2.5%。

表2 样本地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宗教信仰情况

宗教	无宗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其他变量
比例	86.7	6.8	3.2	2.3	0.1	0.2	0.7

2. 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

通过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达11人,情感支持网络规模为4人,可借钱5000元以上的财务支持网规模为3人,规模依次递减。由此可见在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中,能起到情感支持和财务支持作用的社交网络规模较小,仅占总社会网络规模的1/3左右。

3. 宗教信仰与社会网络规模

如表3所示,就社会网络规模而言,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明显比无宗教信仰者大,平均每人多出4.5个好友。但在情感支持网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方面直观上没有显著差异,需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3 信教者与非信教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对比

	所有朋友或熟人	诉说心事的朋友或熟人	借钱5000元以上的朋友或熟人
有宗教信仰	17.9	5.0	3.3
无宗教信仰	13.4	4.3	3.0

(四) 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探讨两者的因果关系,衡量宗教对社会网络影响的大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y_i = \alpha + \beta_{1i} \text{rel}_i + \beta_{2i} \Omega + \mu$$

其中,因变量 y 为衡量社会网络的三个指标, $i=1,2,3$ 分别表示社会网络、情感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 rel_i 表示有无宗教信仰(0=不信教;1=信教), Ω 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层面、家庭层面、村庄层面和省级虚拟变量的控制变量,即受访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类型、是否是中共党员、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村户籍人口和省级虚拟变量。

后文实证分析时,首先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建立OLS基准回归,然后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检验假设H1、H2和H3,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 OLS 回归结果

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第2列为宗教对社会网络规模的回归结果,第3列为宗教对情感支持网规模的回归结果,第4列为宗教对财务支持网规模的回归结果。通过三个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宗教信仰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具体分析如下:

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大部分变量的结果符合预期,并且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显著性。通过表4显示,相对于不信教的农村居民,信教者拥有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和情感支持网,假设H1和H2得到支持。但在财务支持网规模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假设H3未得到支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信教的农村居民比不信教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高出1.84个好友(表4中第2列的第2行),情感支持网规模高出0.63个好友(表4中第3列的第2行),两者都表现出高度的显著性。对于财务支持网规模而言,虽然估计系数是正向的,但是在统计意义上不够显著(表4中第4列的第2行)。可见,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财务支持网规模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也可以得出影响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的因素。例如,女性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显著低于男性居民。属于中共党员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等。其他变量在三个模型中表现的结果略有不同,在此不做赘述。

表4 信教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1.84 ^{***}	0.63 ^{**}	0.09
(信教=1)	(0.63)	(0.26)	(0.13)
性别	-1.43 ^{***}	-0.44 ^{***}	-0.47 ^{***}
(男性=1)	(0.29)	(0.10)	(0.07)
汉族	-0.99 [*]	0.17	0.16
	(0.60)	(0.27)	(0.14)
年龄	0.14 ^{**}	0.06 ^{**}	0.09 ^{***}
	(0.07)	(0.03)	(0.02)
年龄的平方	-0.00 [*]	-0.00 [*]	-0.00 ^{***}
	(0.00)	(0.00)	(0.00)
婚姻	-0.09	0.09	0.52 ^{***}
	(0.55)	(0.21)	(0.13)
工作类型 ^a			
私有企业	-1.64	-0.45	-0.44
	(1.17)	(0.41)	(0.31)
自雇佣	-0.02	-0.16	-0.32
	(1.16)	(0.40)	(0.31)

续表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务农	-1.54 (1.11)	0.02 (0.38)	-0.62** (0.31)
没有工作	-2.03* (1.15)	-0.10 (0.41)	-0.84*** (0.31)
中共党员	4.35*** (1.04)	1.39*** (0.44)	0.95*** (0.26)
教育 ^b			
小学	(1.04) 0.41	(0.44) -0.04	(0.26) 0.17
初中	(0.49) 0.55	(0.19) 0.27	(0.11) 0.32***
高中	(0.56) 1.57**	(0.21) 0.55**	(0.12) 0.75***
大专及以上	(0.68) 1.99*	(0.25) 1.09**	(0.16) 1.32***
工作经历 ^c			
有外出打工经验	-1.35* (0.76)	0.04 (0.27)	0.26 (0.17)
无外出打工经验	-1.78*** (0.65)	0.02 (0.24)	0.10 (0.15)
收入分组 ^d			
中低收入组	0.00 (0.71)	0.16 (0.26)	0.13 (0.16)
中等收入组	0.65 (0.66)	0.21 (0.23)	0.29** (0.14)
中高收入组	0.83 (0.74)	0.65** (0.26)	0.56*** (0.17)
高收入组	0.99 (0.89)	0.57** (0.28)	0.80*** (0.19)
家庭人数	-0.11 (0.10)	-0.06* (0.03)	0.03 (0.02)
村户籍人口	-1.80*** (0.44)	-0.17* (0.10)	-0.30*** (0.08)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44*** (3.26)	2.82** (1.42)	2.38* (1.27)
观察值	11 712	11 739	11 725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3) 参照组: a 为政府和事业单位 b 为文盲 c 为没有工作过 d 为低收入组。

(二)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考虑到以下两个原因,本文 OLS 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第一,信教和社会网络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即社会网络规模大的居民也可能被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影响而信教。第二,遗漏变量问题。农村社会中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例如,农村中的风土人情、集体意识等,这些变量在本文的模型中没有充分进行控制。因此,上述 OLS 回归结果仅能刻画出信教和社会网络规模的相关关系,却很难衡量二者的因果关系。为克服上述模型中的内生性,本文主要采用工具变量的识别策略进行解决。

1. 工具变量的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本村是否有教堂”或者“本村是否有清真寺”作为工具变量。首先,从现实意义的角度讨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时间上的外生性。一般情况下,村中修建的宗教建筑物时间较早,一般情况下,早于样本人群形成社会网络的年龄。因此,该变量不会对社会网络产生影响。(2)空间维度上的外生性。宗教建筑物属于外生地理标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当地居民信教的可能性,但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没有影响。因此,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看,本村宗教建筑物与农村居民是否信教有关,与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无关。为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对不同宗教建筑物组合的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检验,如表 3 所示,本文主要验证了三种情况:模型(1)选取本村是否有教堂、清真寺和寺庙作为工具变量;模型(2)删除了不显著的寺庙变量,以本村是否有教堂和清真寺作为工具变量;模型(3)选取本村有清真寺或者教堂作为工具变量。

通过表 5 显示,3 个模型弱工具变量的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在大于 10%的水平上拒绝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约 16.4),因此,三个模型都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但是,由于模型(1)和模型(2)的过度识别检验指标 LM 统计量 P 值为 0,所以模型(1)和模型(2)存在过度性识别问题,而模型(3)则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由此本文采用模型(3)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一步回归,即选择本村是否有教堂或者清真寺作为基准模型中信教(*reli*)的工具变量。

表 5 工具变量选择:本村宗教建筑对信仰宗教的影响

	(1)	(2)	(3)
教堂	0.07 *** (-0.01)	0.07 *** (-0.01)	-
清真寺	0.67 *** (-0.02)	0.67 *** (-0.02)	-
寺庙	0.01 (-0.01)	-	-
教堂或者清真寺	-	-	0.29 *** (-0.01)

续表

	(1)	(2)	(3)
其他变量	略	略	略
样本量	11 712	11 712	11 712
Adjusted R ²	0.19	0.19	0.13
F 统计量	52.20	57.00	37.80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44	502	525
过度识别检验			
LM 统计量 P 值	0	0	-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2.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信教者具有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和更小的财务支持网规模,在情感支持网规模方面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就社会网络规模而言,信教的居民比不信教的居民平均多 5.18 个朋友,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 6 中第 2 列的第 2 行)。与 OLS 回归结果相比,其系数有所增加,但显著性水平是一致的。对情感支持网规模而言,信教对情感支持网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表 6 中第 3 列的第 2 行),但是变量的符号和 OLS 回归结果相同。对于财务支持网络而言,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财务支持网平均少 2.85 人,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 OLS 估计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差异较大(表 4 中第 4 列的第 2 行)。

总体来看,工具变量的结果与 OLS 的估计结果呈现出一定的变动。假设 H1 得到支持,假设 H2 未得到支持,假设 H3 得到相反的结论,即信教的农村居民财务支持网规模更小。对此,本文在后面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

表 6 信教与农民的社会网络:使用 IV 估计的结果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5.18 ***	0.71	-2.85 ***
(信教 = 1)	(1.97)	(1.32)	(0.80)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39 ***	3.71 ***	2.48 **
	(2.98)	(1.33)	(1.19)
观察值	11 712	11 738	11 725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三) 信教影响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渠道

正如前面理论部分解释,信仰宗教人群可能更愿意通过参加宗教活动、集体活动以及慈善活动等非正式性的活动来增加社会网络的构建。为进一步探讨信教人群影响社会网络的途径,本文试图从农村居民参与组织活动的角度探讨信教人群对社会网络影响的机制。

由于 CLDS 数据库中缺少反映农村居民参与组织活动的相关变量,本文采用 CGSS (2010) 调查数据进行检验。选取“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捐赠行为”和“参与社交活动频率”三个指标反映农村居民参与组织活动的情况。“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正式的宗教活动,“捐赠行为”可以代表非正式的宗教活动,“参与社交活动频率”可以代表宗教外的其他组织活动。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主要询问农村居民“您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的频率如何?”。受访者从“一年不到1次”“一年1—2次”“一年几次”“一月1次”“一月2—3次”“差不多每周都有”“一周几次”7个选项中进行选择,作者将“一年1—2次”和“一年几次”归为一类,“一月1次”和“一月2—3次”归为一类,“差不多每周都有”和“一周几次”归为一类,因此最后分为五个等级并且频率依次增加。“捐赠行为”主要是询问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是否向宗教机构和个人(例如,神父、牧师、和尚等)捐赠钱或物”。“参与社交活动频率”主要是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的空闲时间中参加社交活动的频率。受访者从“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五个不同等级中选择一个回答。由于参加宗教活动频率和社交活动的频率依次增加,此处采用 Ordered-Logit 模型进行估计。“是否向宗教机构捐赠”只有两项选择,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7。

通过表7得出,信教的农村居民更愿意参加宗教活动、更愿意向宗教机构捐赠财物以及更愿意在空闲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信教的农村居民显著地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表7,第2行第2列)。由此可以判断,信教人群可能会通过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来增加自己的社会网络规模。并且,信教人群更愿意向宗教机构捐赠财物,更愿意参加一些慈善活动(表7,第2行第3列)。除了宗教活动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信教人群更愿意在空闲时间参与社交活动(表7,第2行第4列)。由此可以看出,信教的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以及其他的社会活动获取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

表7 信教对参与社会活动的影响结果

	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	是否向宗教机构捐赠	参与社交活动频率
信教	3.45***	1.78***	0.39**
(信教=1)	(15.83)	(9.35)	(2.57)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参加宗教活动频率	是否向宗教机构捐赠	参与社交活动频率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略	略	略
观察值	1 642	1 628	1 636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2)*、**、***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下面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其他工具变量以及CLDS的2016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倾向得分匹配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试图通过匹配再抽样的方法使观测数据尽可能地接近随机试验数据,减少观测数据的偏差。本文分别使用一对一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进行匹配,由于匹配结果相似,本文只汇报一对一匹配的结果。图1至图3分别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情感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模型进行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的验证结果。每幅图的左侧为平行性假设,右侧为共同支撑假设。不难看出,在计算平均干预效果(ATT)之前,我们的数据很好地满足了这两个假设。

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社会网络平均多2.3人,且t值为2.48(大于1.96)结果高度显著。同样,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情感支持网平均多0.68人,也是高度显著的。但是,财务支持网匹配后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可见信仰宗教的农村居民比不信教者拥有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这一结果依然是稳健的,而情感支持网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方面结论不够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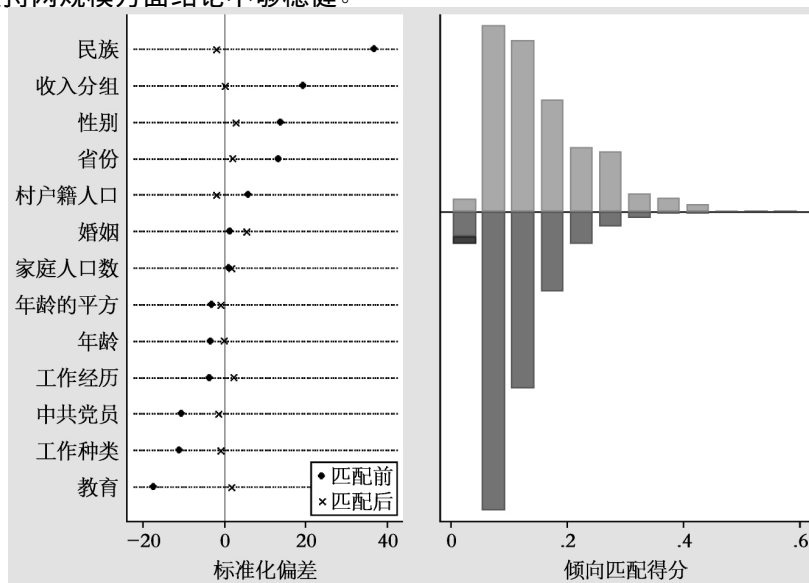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网络的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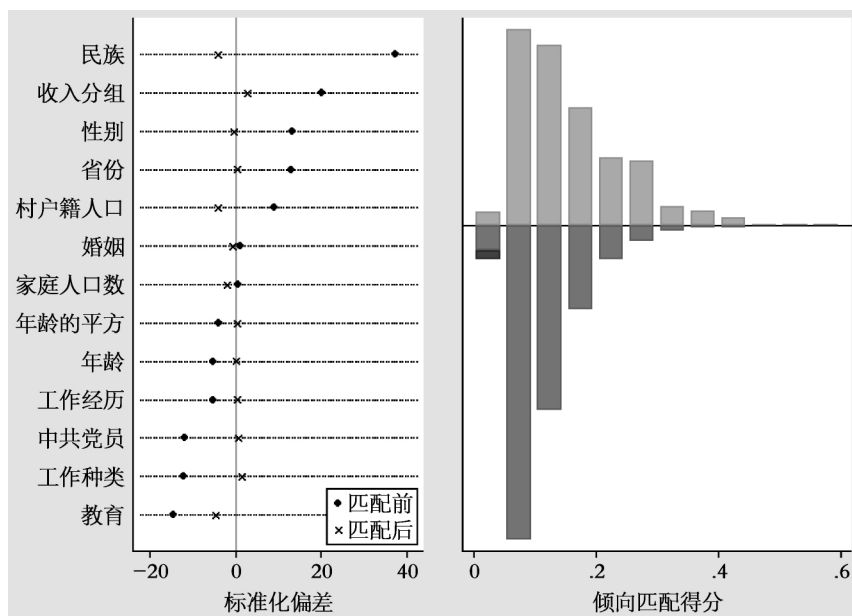


图2 情感支持网的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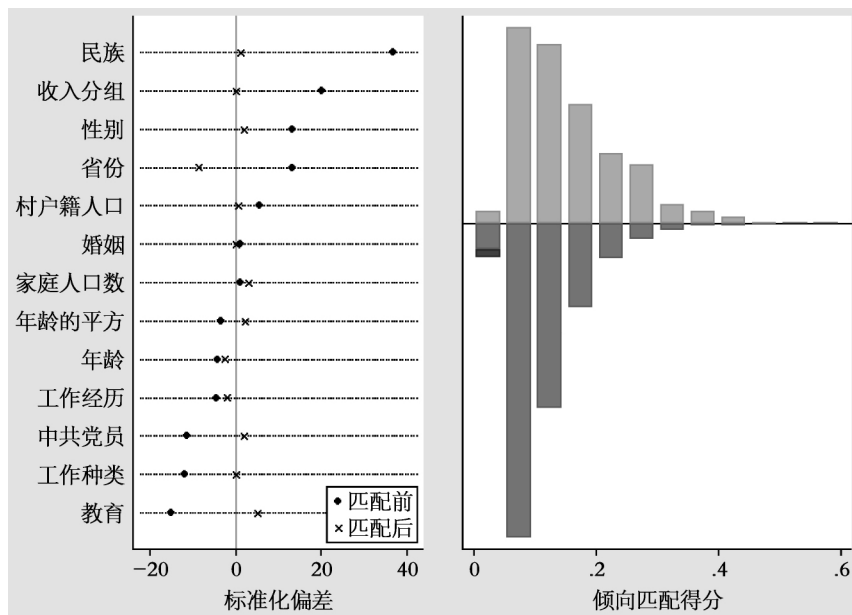


图3 财务支持网的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表8 使用PSM估计的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结果

变量	匹配类型	控制组	对照组	差异	标准误	t值
社会网络	Unmatched	11.30	10.09	1.21	0.49	2.48
	ATT	11.32	9.03	2.30	0.68	3.36
情感支持网	Unmatched	4.54	3.95	0.58	0.17	3.36
	ATT	4.54	3.86	0.68	0.26	2.62
财务支持网	Unmatched	2.86	2.74	0.121	0.11	1.04
	ATT	2.86	2.47	0.40	0.26	1.54

注:此处只汇报一对一的近邻匹配结果,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所得结果相似,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二) 采用其他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上文中主要采取“受访者所在村是否有宗教建筑物”作为工具变量估计信教对受访者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然而,不同地区的村庄宗教建筑物的数量不同,进而对当地居民信教的影响程度产生差异。基于此,本文采取“受访者所在村中教堂、清真寺和寺庙的数量”作为受访者是否信教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表9第2行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受访者所在村中宗教建筑物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与采用“是否有建筑物”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因此,可以进一步得出,信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显著增加,微弱减少财务支持网规模,但是对情感网络没有显著影响。

表9 信教与农民的社会网络:使用宗教建筑物数量作为IV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2.86 **	0.28	-0.57*
(信教=1)	(1.37)	(0.61)	(0.32)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63 **	3.73 ***	1.57
	(2.73)	(1.25)	(1.10)
观察值	10 861	10 861	10 403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2)*、**、***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3)第一步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做汇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三) 利用2016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前述模型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体现的是个体的个性,通常横截面数据表现的是无规律的而非真正的随机变化。为克服无法观测的异质性,作者选取CLDS2016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处采取“村中是否有宗教建筑物”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

计结果如表 8 所示。

通过表 10 所示, 2016 年调查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与使用 2014 年调查数据结果类似。信仰宗教的农村居民依然具有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 估计系数由 5.18 减小到 4.64。宗教信仰对情感支持网依然不显著, 并且估计的系数符号依然相同。但是, 宗教信仰对财务支持网的估计结果变得不再显著, 但是影响的符号依然相同。

表 10 信教与农民的社会网络: 使用 IV 估计的结果(2016 年数据)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4.64 ***	1.75	-0.38
(信教 = 1)	(0.96)	(1.23)	(2.45)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5	1.82	8.64 ***
	(0.82)	(1.33)	(2.57)
观察值	11 003	11 041	11 038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2) *、**、***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六、进一步探讨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 接下来作者将宗教细分。本文对宗教采取两种细分方法: 一是将宗教分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 二是分为本土宗教、非本土宗教和其他宗教^①。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存在内生性, 难以对每个变量都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 作者只是细分宗教后采取 OLS 回归, 进行简要探讨。回归结果如表 11 和表 12 所示。

通过表 11 可以看出, 不同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表现出差异化的影响。信仰佛教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多的社会网络, 其中包括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情感支持网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信仰基督教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小的财务支持网规模。如表 12 所示, 信仰本土宗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更大, 包括更大的情感支持网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但是, 信仰非本土宗教的居民拥有更小的财务支持网规模, 社会网络规模和情感支持网规模没有表现出显著变化。上述分析与 CRS 的调查结果相吻合, 佛教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传统宗教, 并且在公益慈善方面贡献最多。信教者可以通过更多的慈善活动拓展社会网络规模。

^① 此处借鉴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本土宗教、宗族网络与公共财政》中的分类方法。

表 11 不同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宗教种类(不信教为基准组)			
基督教	1.11 (1.41)	-0.14 (0.36)	-0.63 ^{***} (0.21)
佛教	2.39 ^{***} (0.85)	1.10 ^{***} (0.38)	0.95 ^{**} (0.42)
伊斯兰教	1.36 (1.29)	0.51 (0.79)	-0.33 (0.34)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62 ^{***} (3.26)	2.99 ^{**} (1.41)	1.62 (1.41)
观察值	10 617	10 617	10 864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2)*、**、***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12 本土宗教和非本土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宗教种类(不信教为基准组)			
本土教	2.30 ^{***} (0.83)	1.07 ^{***} (0.37)	0.92 ^{**} (0.41)
非本土教	1.12 (0.99)	0.03 (0.35)	-0.53 ^{***} (0.18)
其他宗教	1.36 (1.29)	0.51 (0.79)	-0.33 (0.34)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6 (3.57)	3.42 ^{**} (1.43)	1.95 (1.47)
观察值	10 617	10 617	10 864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2)*、**、***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另,本土教为佛教、道教;非本土教为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七、研究结论

利用 CLDS 的全国微观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信教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在 OLS 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同时,采取了多种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呈显著正向作用。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宗教通过影响信教者的价值观和信仰,对其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从精神层面来看,信教者会更加信任对方,更愿意结识陌生人,与陌生人合作(Iannaccone,1998;Orbell等,1992)。他们往往具有善意的举动和更好的精神健康等(Iannaccone,1998;Putnam,2000)。对于一般农村居民而言,其社会网络构成常以同村的亲戚、邻居为主,与陌生人接触的机会和意愿较少(黄瑞芹,2009),信教人群可能有更开放的心态,更主动地与陌生人进行接触和交流,因此信教的农村居民会结识更多好友。

从行为层面来看,农村中老年居民闲暇时间通常是与相熟的亲友在一起,且娱乐活动较为单一,很难有机会像城市居民那样通过某一兴趣爱好扩展其社交范围,故其社会网络也以亲缘关系为主(黄瑞芹,2009;费孝通,1985)。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信仰本土宗教者通常有更多的宗教仪式和宗族活动(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宗教信仰能增加教会内部信教群众的社会互动频度,通过统一教会条例使信教群众社会规范趋同,增加其相互信任程度,提高信教群众的互惠、信任与规范(霍鹏等,2016)。通过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及非正式的集体活动,信教者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Ruffle和Sosis,2007;Putnam,2000;Brooks,2005)。因此,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扩张可能性更大,宗教对社会网络规模呈正向显著影响。

第二,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情感支持网络规模无显著作用。在普通好友数更多的基础上,信教的农村居民可诉说心事的好友并未随之增多。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影响,农村居民的熟人信任水平可能低于家人信任水平(阮荣平和王兵,2011)。已有研究表明,在农村居民的重要问题讨论网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父母、配偶(费孝通,1985;张文宏,2006)。农村居民在情感行为中使用更多的是强关系(黄瑞芹,2009),邻居、朋友这类非亲缘弱关系本身就占比较小。因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宗教信仰对家人信任水平的增加作用低于其对熟人信任水平的增加作用,所以未见其对情感支持网规模的显著影响。

第三,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财务支持网规模存在负向影响。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在稳健性检验中表现出一致的结论。因此,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应有所保留地对待,宗教信仰对财务支持网的作用还应进行进一步探究。

第四,区分不同宗教的研究结果表明,信仰本土宗教特别是信仰佛教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CRS 的研究报告表明,佛教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在公益慈善方面的贡献也是最大的。这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信仰本土宗教特别是信仰佛教的农村居民可能存在更多有相同信仰的信徒伙伴,给予他们

信仰支持;同时在社会交往中会有更加丰富的异质性渠道,更多地参与正式的宗教活动及非正式的公益慈善活动、志愿活动,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扩展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相比之下,外来宗教更难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更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从而影响其信教者的普遍信任水平(霍鹏等,2018),因此导致信仰外来宗教的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更小。

本文对我国农村居民信教对社会网络的影响进行了较为严谨的研究。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对于宗教与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尚少,对于农村居民宗教信仰和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更是几乎空白。本文运用微观调查数据,将研究主体聚焦于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所得描述性分析对于摸清我国农村居民日益变化的宗教信仰情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构建的计量经济模型则更深入地检验了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正如 CRS 研究结果所示,当代的中国宗教与国家政府之间保持了和谐的关系,从民众的灵性、道德、心理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作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我国政府应当合理引导宗教组织健康发展,促使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更好地发挥正向作用。

参 考 文 献

- Anderson, L. R., J. M. Mellor and J. Milyo, 2004, "Social Capital and Contributions in a Public-Goods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373-376.
- Bainbridge, W. S. and R. Stark, 1981, "Friendship, Religion, and the Occult: A Network Study,"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22(4): 313-327.
- Birley, S., 1985, "The Role of Network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1): 107-117.
- Borgatti, S. P., A. Mehra, D. J. Brass and G. Labianca, 2009,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3(5916): 892-895.
- Boyd, D. M. and N. B. Ellison,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210-230.
- Brooks, A. C., 2003, "Religious Faith and Charitable Giving," *Policy Review*, 121, 39-50.
- Brooks, A. C., 2005, "Does Social Capital Make You Generou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6(1): 1-15.
- Buchanan, J., 1971, *The Bas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Published by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Burchardi, K. B. and T. A. Hassan, 2013,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ocial Ties: Evidence from German Reunifi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3): 1219-1271.
- Burt, R. S., 1984, "Networks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4): 293-339.
- Butler, J. E. and G. S. Hansen, 1991, "Network Evolution,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1): 1-16.
- Cela, K. L., M. A. Sicilia and S. Sánchez, 2015,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E-Learning Environments: A Preliminary Systematic Review,"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7(1): 219-246.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Greer, T., M. Berman, V. Varan, L. Bobrycki and S. Watson, 2010, "We Are a Religious People; We Are a Vengeful Peopl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4(1): 45-57.
-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03,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Journal of Monetary*

- Economics* , 50(1) : 225-282.
- Iannaccone , R. L. , 1998 ,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36(3) : 1465-1496.
- Jackson , M. O. , 2003 , *The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Networks* , Networks and Groups , Published by Springer.
- Kilduff , M. and W. Tsai , 2003 , *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 Published by SAGE.
- Orbell , J. , M. Goldman and M. Mulford , 1992 , “Religion , Context and Constraint toward Strangers ,”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 4(3) : 291-307.
- Putnam , R. D. , 2000 ,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 Ruffle , B. J. and R. Sosis , 2007 , “Does It Pay to Pray? Costly Ritual and Cooperation ,”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 7(1) : 1-37
- Seligman , A. B. , 1997 , *The Problem of Trust* ,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 D. A. and F. T. Lohrke , 2008 ,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Development: Trusting in the Process ,”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 61(4) : 315-322.
- Smith , D. A. and F. T. Lohrke , 2008 ,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Development: Trusting in the Process ,”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 61(4) : 315-322.
- Wal , A. L. J. T. and R. A. Boschma , 2009 , “Apply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Economic Geography: Framing Some Key Analytic Issues ,”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 43 , 739-756.
- Welch , M. R. , D. Sikkink , E. Sartain and C. Bond , 2004 , “Trust in God and Trust in Man: The Ambivalent Role of Religion in Shaping Dimensions of Social Trust ,”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 3 , 317-344.
- 费孝通 , 1985 , 《乡土中国》 , 三联出版社。
- 郭云南和王春飞 , 2017 , 《本土宗教、宗族网络与公共财政》 , 《经济学(季刊)》第1期 833—858页。
- 黄瑞芹 , 2009 ,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资本——基于三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 , 《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14—21页。
- 霍鹏、张静宜和彭楚乔 , 2016 , 《社会互动与信任对农民参与“新农保”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2010 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 《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 68—76页。
- 霍鹏、严如贺和阮荣平 , 2018 , 《宗教信仰与普遍信任: 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 CGSS2012 的数据分析》 , 《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 78—98页。
- 金泽和邱永辉 , 2008 , 《中国宗教报告(2008)》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金泽和邱永辉 , 2012 , 《中国宗教报告(2012)》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金泽和邱永辉 , 2013 , 《中国宗教报告(2013)》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阮丹青、周路和布劳 , 1990 , 《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兼与美国社会网比较》 ,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157—176页。
- 阮荣平和刘力 , 2011 , 《中国农村非正式社会保障供给研究——基于宗教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析》 , 《管理世界》第4期 46—57页。
- 阮荣平和王兵 , 2011 ,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 《社会》第4期 195—217页。
- 阮荣平、郑风田和刘力 , 2014 , 《宗教信仰与社会冲突: 根源还是工具》 , 《经济学(季刊)》第2期 793—816页。
- 谭飞、陈晓虎和刘书云 , 2007 , 《西部农村“信仰流失”警示》 , 《瞭望》第6期 6—8页。
- 王宇和王士权 , 2017 ,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 , 《农业技术经济》第11期 92—103页。
- 杨汝岱、陈斌开和朱诗娥 , 2011 ,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 , 《经济研究》第1期 116—129页。
- 叶敬忠 , 2004 , 《农民发展创新中的社会网络》 , 《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37—42页。
- 易行健、张波、杨汝岱和杨碧云 , 2012 , 《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第5期 43—51页。
- 张文宏和阮丹青 , 1999 ,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 , 《社会学研究》第3期 14—19页。

张文宏、阮丹青和潘允康,1999,《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第2期 110—120页。

张文宏,2006,《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

章元、李锐、王后和陈亮,2008,《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基于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73—84页。

郑风田、阮荣平和刘力,2010,《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经济学(季刊)》第3期 829—850页。